

下列证件
声明作废

·荷塘区湘道
食坊遗失
JY24302020315533号
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
·株洲市芦淞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遗失
11430203M
B1E386286号机关单
位法人证正本
·钟铁钢遗失株
洲市芦淞区银谷市场
3F68号门面的
8002054号收据,押金
3000元
·钟铁钢遗失株
洲市芦淞区银谷市场
3F35号门面的
8033860号收据,押金
2000元
·杨婷遗失
00017937号株洲新锦
江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往来结算统一凭据,
保证金25000元

株洲往事

水口的阳光

罗荣国

在我心里无数次被猜想过、抚摸过的水口,终于在去年十月,与我匆匆相遇。

踏进水口,明媚的阳光从澄蓝的天空倾泻而下,将大地染成一片金黄。友人告诉我,水口虽是湖南的一个小镇,却因红军曾在此作出的重大决策而闪耀荣光。置身于此,我在目睹湘南山水磅礴风光的同时,更深切地感受到了当年充满诗意的红色旋律和飞扬的激情——

1927年秋收起义受挫后,毛泽东主张向湘南转移,原计划是到广东向南昌起义的部队靠拢,但在抵达水口之前,一段惊心动魄的插曲改变了历史的走向。这年6月,年仅18岁的宋任穷在湖南浏阳担任党代表,随军准备参加南昌起义,却在途经江西高安时得知起义已经爆发,部队受阻。危急时刻,宋任穷奉命寻找江西省委。几经周折,他终于找到了省委书记汪泽楷,并拿到了一封用盐水密写的指示信。在莲花县郊的陈家坊,毛泽东见到了宋任穷,更读到了这封至关重要的密信。

紧接着,毛泽东主持召开前委会议,传达指示精神,听取汇报,分析形势。这封密信虽然具体内容已不可考,但对毛泽东后来率部上井冈山的决策起到了关键作用。

10月14日,毛泽东率部抵达邵阳县(今湖南省炎陵县)水口,进行了为期九天的休整。这九天,是决定性的九天。在这里,毛泽东广泛进行社会调查,并在叶家祠亲自主持了六名新党员的入党宣誓,成立了全军第一个连队党支部,这便是著名的“连队建党”。

然而,局势瞬息万变。毛泽东从国民党的报纸上获悉南昌起义部队在潮汕失败、下落不明,继续南下已无意义。15日,派往茶陵探察的周礼带回急报:湘东清乡司令罗定正率千余人分两路进剿邵县。更严峻的是,16日清晨,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师原师长余洒度、三团原团长苏先俊竟逃离了队伍;次日,被派去放哨的一个排也在排长煽动下携枪逃跑。

内忧外患之下,毛泽东深感部队必须改变流寇式的行军,尽快找一个地方“安家”。通过对沿途政治、经济条件的详细比较,他将目光投向了罗霄山脉中段——井冈山。那里地处湘赣边界,五百里峭壁悬崖,地势险要;且盛产稻谷木材,经济基础较好;更有袁文才、王佐两支地方武装可以争取。

于是,在水口,毛泽东果断拍板:部队折向遂川,上井冈山!10月22日,红军迎着朝阳离开水口,踏上了开辟中国革命新篇章的征途。

此时此刻,我就站在当年毛泽东居住过的水口镇桥头江家小院。门楣上,郭沫若题写的“毛泽东同志率领工农红军向井冈山进军途中旧址”金字匾额,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屋旁那两棵高大的乌柏和一棵千年古松,伴着渐渐远去的河水,仿佛在喃喃诉说着那些往事——

这里有一块红色浮雕。“水口是个好地方。”这是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时顺口对江兴感叹的。他说:“支部建在连上和发展新党员都是到水口以后的事情……我们在那里发展了秋收起义后的第一批党员。”

这里有一盏灯。毛泽东曾住过的桌上,那一盏煤油灯记载了多少个辗转反侧的不眠之夜。一团团长张子清常在这灯下与毛泽东促膝夜谈。也就是这位张子清,后来在接龙桥战斗中负伤,伤口溃烂流血,却将群众送来消毒的食盐舍不得用,转送给其他重伤员。张子清最终因感染光荣牺牲,“团长献盐”的故事,至今仍在炎陵流传。

这里有一枚银元。也是在水口,深夜伏案工作的毛泽东,看到房东江大嫂端来的一碗热红薯,坚持不肯收,送给了战士们,并掏出一块银元交给江大嫂:“这碗红薯是老百姓的深情厚意,但我们革命军队有纪律,不拿百姓一针一线。”

这里还有一件衣服。10月中旬,天气转寒。我缝们听说毛泽东深夜常披着薄毯写文章,便一边赶制军衣,一边特意为他做了一件中山装。后来上井冈山时,毛泽东穿着这件新衣主持会议,笑着说:“这件新衣还是邵县水口做的,这是我的第一件中山装!”

我缓缓走出江家小院,只见十几位身着红军服的游客正在合影,他们一脸庄重,满怀敬畏。友人低声说:“经历百年风雨,水口的一切依然鲜活。”

此时,河对岸传来了悠扬的歌声——“水口是个好地方!毛泽东亲口讲。热腾腾的红米饭,南瓜汤特别香。连队建党建军魂,革命从此上井冈……”

十月的水口,阳光灿烂,风光旖旎。我在这片被炮火翻耕过、被热血浸润过的土地上向东眺望,只见在刚如刀刃的井冈山余脉上,浮水河畔着金色的朝晖,仿佛在书写那段光辉历史;涑水河畔的咆哮水声,似在叙述那段如烟往事。

我知道,水口决策就像黑暗中的曙光,照亮了革命的前路;就像严寒里绽放的腊梅,从容面对凛冽寒霜;更像雨后的一道彩虹,为革命事业架起了一座通往希望的桥梁……

这就是水口的阳光。

我终究是深水养大的孩子,血脉里流淌着它赋予的勤恳与执着,也藏着对生活最质朴的热爱。我后来走过许多江河,它们或许更壮阔,却未曾像涑水这般,从我生命最初的源头流过,灌溉我、塑造我,成为我精神上永恒的故乡。这一次离去,我没有频频回首。因为我知道,无论我走到哪里,那一条江,始终在我身体里静静地流淌着;那一头铁牛,始终在我记忆里稳稳地立着;那一座塔,始终在我心里高高矗立着;那“三宝”的清香,始终在我味蕾上萦绕着。

这方水土给我的,从来不是一时的栖居,而是一生的根。

水口桥头江家,毛泽东同志当年居住过的地方。



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旧址,1927年,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二次攻克茶陵后,在此开启了“工农武装割据”的伟大实践。

茶陵县委大院内的常委楼,毛泽东同志当年曾下榻于此。

株洲风物

进入茶陵地界,熟悉的气息便扑面而来——那是草木的清香、泥土的湿润和江水的腥甜交织的味道,仿佛久别重逢的老友,张开温暖的怀抱迎接我的归来。

茶陵是我生命的起点,承载了我生命最初的记忆。虽然父母早在1981年就带着妹妹回了宁乡老家,茶陵的屋檐下早没了至亲的炊烟,可我总忍不住一次次回到这里。因为,这里有比亲人更恒久的牵绊——是东门塔高高矗立在涑水河畔的剪影,是县委红砖楼里飘散的笔墨香,是工农兵政府屋檐下飘扬的红旗,是涑江河里的鱼,是云阳山的松涛,是那些镌刻在骨头上的记忆。

最难忘下东公社的日子。1981年冬天,我作为工作队队员,住在四壁漏风的贫困户家,夜里裹两床棉被仍觉寒冷。白天跟着社员下田,晚上在昏暗的灯下记笔记,泥土腥气混着油墨味,成了那段时光的专属气息。为核实亩产数据,在打谷场蹲守三天跟着老农学着谷粒饱满度,那篇沾着田垄草汁的通讯稿,最终登在《株洲日报》头版,报社同志称赞“满足泥土气”。

1984年春天,也是在这间办公室,市委组织部的调令悄然而至。那天我刚从乡下采访回来,裤脚还带着泥土,理论干事陈志刚塞给我一个笔记本:“小钟,这是要飞了,到了新地方,别丢了笔杆子。”那本子我至今还留着,扉页写着他送我的话:“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从此,我从茶陵出发,辗转长沙、北京、陕西,脚步越远,心底的涑水却流得越急。

沿主楼右角前的小路前行,一栋不起眼的苏式小楼藏着厚重记忆——1965年5月21日,毛主席重上井冈山时,便是在这栋常委办公楼的25号房留宿。如今房间设为陈列室,简朴依旧。我驻足良久,想起当年常听老领导讲述毛主席深夜研读《茶陵志》至凌晨的往事,那份对故地的深情与对历史的敬畏,至今令人动容。更可敬的是,历任县委领导始终“蜗居”于此,将资金多用于民生,这栋简陋小楼也被誉为“湘东最美的办公楼”。

稻穗红绸,烽火淬炼的初心传承。从县委会出来,沿解放路往东,转过街角,一片青灰色瓦檐映入眼帘——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旧址到了。1927年,工农革命军第二次攻克茶陵后,在此开启了“工农武装割据”的伟大实践,被埃德加·斯诺称为“全国第一个红色政权”诞生地。

这座由南宋州署改建的院落青砖黑瓦,庄严肃穆。大堂内悬挂着马克思、列宁画像,两侧陈列着工农革命军使用的红缨枪,还原着当年首次工作会议的场景。穿过天井,斑驳土墙上的一抹红漆字迹虽已模糊,却仍透着穿透时光的力量。忽然想起少年时,东门塔下的一位老爷爷常讲起红军故事:“战士们穿着草鞋,却把仅有的粮食分给乡亲们,说要让天下百姓都有饭吃、有田种。”那时我听不懂这话里的分量,只觉得那些穿着灰布军装的身影,和涑水河畔的芦苇一样,带着韧劲。

回廊尽头的陈列室里,掉漆的木桌、残缺的板凳与布满划痕的马灯,让我想起1983年冬夜整理党史资料的场景——文献记载,茶陵战役中红军夜里作战全靠马灯照明,风雪中晃动的灯光,如星星般明亮。那时我总在档案馆跑,采访老红军,想把茶陵的红色故事写得再深些。1984年5月调离茶陵那天,我把常用的英雄牌钢笔留在了抽屉里,像是把一部分的自己,永远托付给了这片红土地。

院落中央,几株向日葵朝着太阳,花盆沉甸甸的。讲解员说,每年秋收后,百姓会把新收的稻穗系在红绸上挂于屋檐;“这是咱茶陵人的仪式,告慰先烈,今年又是好收成。”望着飘动的红绸,我忽然懂得,这红色旧址不是冰冷陈列,而是早已融入茶陵血脉的精神图腾。当年红军守护的,不仅是政权,更是涑水两岸的稻穗饱满、万户

安居乐业。

穿过庭院,几栋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苏式砖木办公楼映入眼帘,青砖青瓦间掩不住沧桑。二楼东头第四个窗口,是我当年的办公室。桌面的木纹里

藏着前草留下的笔划,阳光投下斑驳,我曾在那里伏案疾书。作为新闻干事,当年的我曾走遍茶陵的山山水水,田间地头的烟火气,乡村村落的新鲜事,都化作了《株洲日报》上带着油墨香的铅字。

嵌着前草留下的笔划,阳光投下斑驳,我曾在那里伏案疾书。作为新闻干事,当年的我曾走遍茶陵的山山水水,田间地头的烟火气,乡村村落的新鲜事,都化作了《株洲日报》上带着油墨香的铅字。

茶陵,岁月深处的眷恋

钟健能

本版各栏目投稿邮箱
yzhy83@163.com

株洲文脉

醴陵——有瓷火,更有书香

袁建光

我裹着暖阳,沿涑水蜿蜒而来,来到千年瓷都,湖南的醴陵。

我也曾去过另一个瓷都,江西的景德镇。两个瓷都,都名不虚传,也各有千秋:宋真宗赵恒御赐的景德镇,带有一丝皇家色彩:青花、粉彩、玲珑、颜色釉,四大名瓷,把釉上彩的绚丽写到极致,像一出浓墨重彩的京剧;而平民出身的醴陵,谦卑地把颜色藏进釉里,像一幅淡雅水墨,愈洗愈新,永不褪色。两座城,两种火,各烧出各自的星辰。

而我今日,更想看的,是火之外的一缕书香。深江在西山下打了个温柔的弯,把整座书院轻轻揽进怀里。深江书院,始建于南宋淳熙二年(1175),近千年间,远尘俗,领清幽,檐角低垂,弦歌不辍。

理学大家朱熹来过,携“格物”之致,招徒讲学,山鸟鸣;心学大家王阳明来过,坐论“良知”,夜雨听灯;左宗棠来过,时年二十五,青衫未旧,已负万里之志,掌教山长,革新学风,开一派先气。后来,书院走出李立三,走出左权,走出更多把名字写进风雷的子弟——书声与炮火,同在此地拔节生长。

我站在书院前,思绪万千,想起了曾在此任山长的左宗棠。道光十六年(1836)暮春,两江总督陶澍回省省亲,舟过醴陵。县令请深江书院山长左宗棠为行馆撰联。二十五岁的左宗棠,提笔一挥——“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

上联写道:光皇帝御赐陶澍的“印心石屋”之荣,暗合君臣际遇;下联借陶澍的先祖陶侃运甓典故,遥寄山河厚望。官至巡抚、五十七岁的陶澍读罢,拍案叫绝,连夜召见,与之促膝长谈,并预言其成就将超越自己。第二天,推迟行程,与左宗棠携手同游醴陵。可谓是一城瓷火,一江春水,两代俊采,星月交辉。

那一夜之后,左宗棠的名字开始朝历史深处疾驰,终成一代名将,收复新疆,名垂青史。深江书院,也多了一层传奇的光彩——从此山门未启,已闻金戈;书声未落,已见战旗。

今日来醴陵,深深以为:瓷与书,皆需一次高烧,一次淬火,才能将颜色与思想,一并留到永恒。醴陵,把颜色藏进釉里,让岁月去磨;书院把志向藏进心里,让时代去磨。磨不尽的,终成传奇。



深江书院正门

广告接待热线 28835396